

钓鱼岛未被揭露的史实

钓鱼台(大陆称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不断，中日间为此激起民族主义情绪，至今风波未定。本文作者刘永宁 1966 年进入台湾《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任社会新闻记者，曾亲自登过钓鱼台。他撰文写道：

无视两岸 美国公然介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没有扩张领土，但战败的日本却扩张领土，并把钓鱼台列屿和琉球群岛窃占。追根究底，原因就是美国介入。

美国“托管”琉球的根据，是 1951 年率 48 个同盟国和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而此约中华民国被排除在外，不能参加。蒋介石在其日记中痛陈：“今天 9 月 3 日为日本投降 6 周年，美在此日于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摒除我国于和约之外，此为对我国最大之辱。”

更令人不平的是，1953 年公布的“27 号”令，根本连通知都不通知，美国就把属

于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的钓鱼台列屿划入琉球群岛内，所以所有美国对日本的承诺、钓鱼台主权的转让，对中华民国而言，不能被承认，更无约束力。今天钓鱼台的冲突，争端，美国虽不是罪魁祸首，但须负极大的责任是无可讳言的。

短暂驻军 台湾最先占有
事实上，从 1949 年开始，我们已实际占领钓鱼台，而且实际应用，并有效管理此岛。

从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的档案以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公开的 1955PF7TH03 档案中，至少有两件事说明钓鱼台被中华民国军方使用。第一次使用的记录比较短，即 1949 年，中华民国游击队自舟山群岛撤退时，一度驻扎钓鱼台列屿。其中还包括传奇性的女游击英雄黄百器(黄八妹)的部队，后来再转往大陈群岛。

第二件和钓鱼台发生关联的，则为“第三清德丸”事件。此事在国际间，闹了

不小风波。事因起于“反共爱国军”从大陈撤退说起：

1955 年 1 月，国民党政府决定主动撤离大陈岛。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自大陈岛撤退后，也曾于钓鱼台短暂驻军。驻扎的部队，也是个女指挥官，名为张希敏。她的部队配有 60 门迫击炮。1955 年 3 月 2 日，站在钓鱼台山顶瞭望的排长，发现有不明大型船只驶向钓鱼台本岛，马上以无线电呼叫迫击炮准备定点射击，结果当此不明船驶近钓鱼台时，被第三枚 60 迫击炮射到船尾边，船上有三人落水，然后开足马力离去。后来从无线电通讯中，察觉是琉球渔船，落海者为三名琉球渔民，此为 1955 年很棘手的“第三清德丸”事件。

此案发生后，琉球指挥部很快对此展开调查，经办此案的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时昭瀛，用中美协防条约中的架构，把美国琉球指挥部说得服服帖帖，很快把全案化之无形，不但没有赔偿，还得

到琉球方面承认该船擅自闯入钓鱼台领海。从此以后，琉球渔民认为钓鱼台是属于台湾，再也不到那里捕鱼了。

由于“第三清德丸”事件的解决，对两次拆船事件提供方便：1967 年 4 月巴拿马籍万吨级货轮“银峰号”在南小岛附近搁浅，台湾的兴南工程公司为拆除沉船，曾于 1968 年派工人上南小岛，在岛上建有房舍并设置起重机等机具；1968 年 3 月，因台风而触礁的台湾籍货船“海生二号”，被风浪打上黄尾屿海岸。1970 年 7 月，14 名台湾工人登上该岛屿，进行拆船作业。

以上几件事实说明，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后，中华民国是最先占有钓鱼台的，并且实际管理、应用，这在将来国际仲裁上，是强而有力的证据，并有公、私文书存放于各处，不是美、日联手能够掩盖的。

《 环球视野》第 540 期，摘自台湾《旺报》2013.3.7 文 / 刘永宁

国民党如何抓共产党：不贪污就是共党分子

共产党人的勇于牺牲不只是在关键时刻，更多的是体现在平常时期的简朴刻苦。范文澜的一段故事可作注脚：1934 年，范文澜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因进步言论而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关了将近一年，后经蔡元培营救才得获释。在他被捕以后，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说情，说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并且把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书。陈立夫听了之后说，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

范文澜出来后，对熟悉他的千家驹说，原来生活俭朴可以是共产党的证据，我今后生活也要“腐化腐化”了。千家驹问他怎么个“腐化”法？他说：“我要做件皮袍子穿穿，也要逛逛中山公园。”千家驹说：“这怎么算‘腐化’呢！这腐化得太不够了。”他笑一笑说：“别的我不会啊！”

1936 年一次吃饭时，范文澜说自己生平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不知道电影院是什么样子。胡适听了大为惊讶。

无独有偶，淮海战役时国民党一方的主将杜聿明与陈立夫有着相似的直觉。1948 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实际指挥东北（辽沈）、徐蚌（淮海）两大会战。这期间，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隐忧，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说起来，郭也是他的黄埔同学，而且在抗战时期屡建战功，深得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的器重。1947 年 3 月，郭汝瑰调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后，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大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颇受器重。对于一个正在得宠的同僚如此猜疑，他杜聿明凭什么？

据杜聿明回忆，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在郭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内已经算是够“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心里认定了郭汝瑰有重大嫌疑，于是多次用不同的方式要求蒋介石不要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作战厅。可尽管如此，他的许多谋划还是通过郭汝瑰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等人，及时出现在了共产党人的指挥部里。更致命的是，由于郭的位置及地位，他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而实质上一旦执行这些提议多会令国民党军陷入更大的危机。徐蚌会战国民党之所以全面失利，与郭汝瑰“吃里扒外”是很有关系的。美国人盖瑞·伯奇研究淮海战役，也对他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淮海战役以后，郭引咎辞职，不久改任军长。

1949 年 12 月 11 日，时任国民党第 72 军军长的郭汝瑰率部在四川起义，直接导致西南数十万蒋军猝不及防，顿成瓮中之鳖。国民党当局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大骂郭汝瑰是“共谍”。

《 文史博览》 文 / 董寅生

身后不得安宁的历史名人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无缘水晶棺的消息一出，不少拥护者对无法永远瞻仰“偶像”的遗容感到失望。也有人认为，这位颇受争议的政治家应入土为安，离尘世间的纷扰更远些。

正如美国作家贝丝·洛夫乔伊在新近出版的《解肢葬：名人遗体千奇百怪的命运》一书中所述，不少生前倍受尊敬的大人物，其遗骸往往不得安宁——被后人争夺、成为政治图腾，乃至遭到肢解、盗窃、跨洋偷运，甚至被塞进行李箱当椅子。

亚历山大大帝
历史学家一致相信，这位接受过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号称从未吃过败仗的马其顿国王，被埋葬在了埃及境内的某地。但今天，已没有谁知道他具体葬在哪里。

公元前 323 年，年仅 32 岁的亚历山大病故于巴比伦。遗体随后被转移到古埃及的孟斐斯市（遗址在今开罗之南），保存了约 20 年，后来重新埋葬在他亲手建立的亚历山大港。公元前 3 世纪结束时，遗体被转移到另一处墓地。

罗马统治时期，凯撒大帝和奥古斯都大帝都去参

拜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奥古斯都弯腰亲吻遗体时，不小心弄掉了亚历山大的鼻子。

伽利略·伽利莱
伽利略生前因坚持“日心说”屡遭教廷迫害，1642 年去世时仍被视为“异教徒”，没人敢为他举办体面的葬礼。

将近一个世纪后，才有科学界后辈发掘出他的遗骸，转移到佛罗伦萨的圣十字大教堂的大理石墓穴中。在此过程中，有好事者取走了一些“纪念品”：伽利略的几根手指、一颗牙齿和一根脊骨。这根脊骨保留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其余物品于 1905 年前后去向不明，直到 2009 年在佛罗伦萨的一次拍卖中重现人世，现收藏于伽利略博物馆。

拿破仑·波拿巴
1821 年客死荒岛后，“皇帝陛下”的遗体又被冷落了 20 载才回归祖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所有人大跌眼镜：验尸官获得了太多自由，竟然割掉了拿破仑的生殖器！

1916 年，这件不寻常的“宝贝”连同拿破仑的一部分私人物品在伦敦进行了

拍卖。1927 年，它在纽约市的法国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数度易手，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一位美国泌尿科医生收藏，存放在一个藏在床下的手提箱里。

这名医生于 2007 年去世，他的女儿继承了所有权。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贝多芬去世后，验尸报告指出，浮肿是夺去这位音乐奇才生命的罪魁——放在如今不过是小小的水肿。大概是为了研究贝多芬丧失听力的原因，负责验尸的医生还从遗体上切除了耳骨，后者随即不知所踪。1863 年后，遗体被安置在一处新建的墓穴中，部分骨头碎片仍散落在外，1945 年曾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的私藏品小规模展出。

1990 年，疑似贝多芬的耳骨惊现美国加州；但直到 2005 年，研究人员才通过对贝多芬的一绺头发进行 DNA 比对，证实了这部分遗骨的主人。

弗拉基米尔·列宁
苏维埃革命领袖长眠之地的神秘程度最低，在红场旁的墓室中，每位游客每次可以瞻仰列宁的遗容 5 分钟。尽管布尔什维克执掌政

南汉皇帝的反腐狠招

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

南汉皇帝选官“阉然后用”
在公元 10 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曾出现一种另类选官绝招——“阉割”。实施这种制度的是南汉。《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刘鋹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

名。

汉武帝提倡“打小报告”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俗语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魏明元帝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的反腐奏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老百姓甚至可以 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

朱元璋惩贪“梟首示众”“剥皮实草”
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 1385

年）下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 60 两以上的，“梟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 1 两银子可以买到 1 石米，也就是说，60 两银子可以买 60 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皮剥下来后，用草填充，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梟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 8 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 北京晚报》2013.3.25 文 / 倪方六